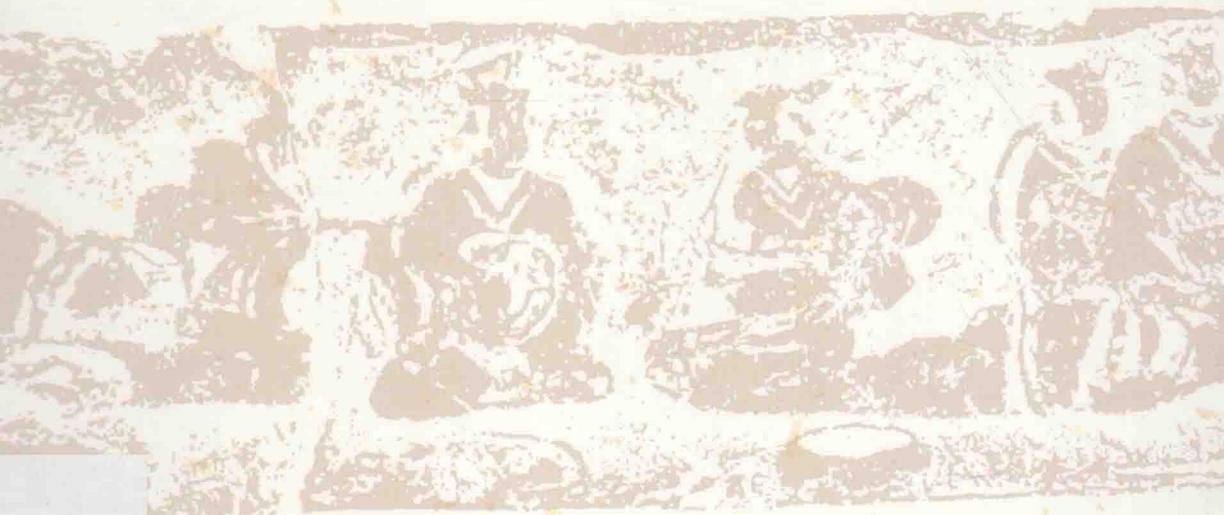


黃帝史实与崇拜研究

李桂民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黃帝史实与崇拜研究

李桂民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帝史实与崇拜研究 / 李桂民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2
ISBN 978 - 7 - 5161 - 5195 - 2

I. ①黄… II. ①李… III. ①黄帝—人物研究 IV. ①K827 =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970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刘 艳

责任编辑 刘 艳

责任校对 陈 晨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net.cn>
中 文 域 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25

插 页 2

字 数 278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	(1)
一 黄帝研究概述与研究缘起	(5)
二 本书的主题、结构内容与研究方法	(7)
第一章 早期姓氏制度的特点与黄帝族姓	(12)
第一节 先秦时期姓氏制度的特点	(12)
第二节 黄帝十二姓考辨	(14)
第二章 初期文明社会与黄帝谱系的形成	(25)
第一节 黄帝发明的传说与族邦社会的形成	(25)
第二节 黄帝谱系的形成和演变析论	(36)
第三章 黄帝谱系中主要族邦与黄帝地望问题	(44)
第一节 少昊、黄帝间关系和少昊之虚	(44)
第二节 巍顼族系与巍项能修黄帝之功	(51)
第三节 帝喾的传说与活动范围	(59)
第四节 帝尧之治与尧都平阳	(64)
第五节 舜之盛德与族群迁徙	(73)
第六节 大禹治水与禹兴西羌的传说	(78)
第七节 黄帝地望的分歧与探索	(88)
第四章 上古族邦间的冲突融合与黄炎子孙认同	(108)
第一节 炎帝、神农氏、烈山氏的纠葛与炎黄关系	(108)
第二节 蚩尤族属与炎黄、蚩尤间的冲突融合	(119)

第三节 黄帝崇拜观念形成的原因	(131)
第五章 古代中国黄帝崇拜观念与民族认同	(138)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黄帝崇拜观念	(138)
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黄帝崇拜观念	(145)
第三节 魏晋迄宋元时期的黄帝崇拜观念	(155)
第四节 明清时期的黄帝崇拜观念	(164)
第六章 民国时期的黄帝崇拜观念	(180)
第一节 古史辨派的黄帝观与古史争论	(180)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黄帝祭祀	(189)
第七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黄帝观及其祭祀活动	(194)
第一节 学术界关于黄帝的主要观点	(194)
第二节 黄帝祭祀视域下的黄帝尊崇观念	(206)
第八章 余论	(212)
参考文献	(225)
后记	(236)

导 论

黄帝研究是古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它不仅和我国上古史的重建密切相关，还是探讨文明起源的重要一环。众所周知，黄帝是古史传说中最显赫的人物之一，被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对黄帝的崇拜由来已久、源远流长，今天我们还自称是“炎黄裔胄”。因此，廓清古史传说中的迷雾，还原黄帝的历史真相，并进而考察黄帝崇拜观念的形成、演变的轨迹，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对黄帝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是从近代开始的，这不能不谈到以《古史辨》为阵地的疑古学派。疑古学派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起在学术界形成的阵容强大的学术派别，该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动摇了被儒家奉为圭臬的“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他认为“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①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古人对于人和神原没有界限，所说历史差不多全是神话”。^②杨宽又进一步发挥了顾颉刚的神话说，把顾氏“积渐造为古史观”发展成“神话演变分化说”，把古史传说等同于神话，不承认传说中史影的存在，把众多传说人物看成皆由原始神话分化演变而来，如认为“黄帝出于‘皇帝’之音变，本为上帝之通名，此皆纯属虚构”，^③这些疑古辨伪工作将原本的许多史料也解释成神话，中国的神话学便应运而生。对这种观点，徐旭生评论说：“他们对于掺杂神话的传说和纯粹神话的界限似

^①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0 页。

^② 《答刘胡两先生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第 100 页。

^③ 《中国上古史导论》，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70 页。

乎不能分辨，或是不愿意去分辨。在古帝的传说中间，除帝颛顼因为有特殊原因以外，炎帝、黄帝、蚩尤、尧、舜、禹的传说里面所掺杂的神话并不太多，可是极端的疑古学派都漫无选择，一古脑儿把它们送到神话的保险柜中封锁起来，不许历史的工作人员再去染指。”^① 王国维也认为：“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②

毋庸讳言，疑古学派的确存在疑得过头的地方，极端疑古学者则走得更远。正是在疑古思潮盛行时，有学者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运用当时考古发现的遗物、遗迹和文献传说资料，对我国的原始社会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吕振羽的《中国原始社会史》就是这样一部把文献传说资料和当时考古水平结合起来对史前史研究的专著，1961年修订出版时更名为《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吕振羽认为传说中的太昊、少昊、黄帝等，“可能都是后人附会或创造的古代氏族部落的代表。那些和某一氏族或部落结合的传说，未必就是属于某一氏族或部落自己的古代遗传，不过这种传说的来源，总有其一个或一群相当的主人，便是可能的”^③。这种看法，同古史辨派把古史传说归入神话、与古史毫无瓜葛的观点有截然的不同，对于今天的黄帝研究，仍不乏重要的启示。另外，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蒙文通的《古史甄微》和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等著作，对传说时期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奠定了我国古史的基本格局。^④ 疑古学派的代表顾颉刚后来也对自己早年的疑古行为做过反思，有过一个更改性意见，认为古史传说中的古帝，或是原始社会的氏族祖先，或是奴隶社会的知识界用理性推测出来的古帝王，到封建社会才形成凝固系统，自己那时不过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来反封建。^⑤

^①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5页。

^② 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③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77—78页。

^④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蒙文通：《古史甄微》，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⑤ 顾颉刚说：“1923年，我和钱玄同先生讨论中国古史问题，主张推翻三皇五帝及禹的历史地位，回复他们的神话地位。现在认识，三皇五帝或是原始社会里的氏族祖先，或是奴隶社会里的知识界用了理性推测出来的古帝王，而是在封建社会里排列成为凝固的系统的。我们那时不过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来反封建。”顾颉刚：《三皇五帝》，载顾洪编：《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黄帝被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中国历史上长期保持着祭祀黄帝的传统，因此，深入考察有关黄帝的史实，探讨祭祀黄帝这一文化现象的历程和文化内蕴，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历览文献记载可以发现，有关黄帝史迹的记载广泛分布于经、史、子、集的大量著作中，内容有数十万字之多。过去有种观点认为，主要记载孔子语录的《论语》就只提到尧、舜，而没涉及黄帝，黄帝的史迹见诸文字不早于战国时期。现在这种观点得到了修正，一般认为，记载黄帝史迹的最早文献是《逸周书·尝麦解》，《尝麦解》的文字和西周较早的金文较为接近，篇中引述的黄帝、蚩尤和启之五子等故事，与《吕刑》的记载互相呼应，当是周穆王初年的作品。到战国时期，黄帝成为先秦诸子纷纷称引的对象，后来司马迁又据此写成《史记·五帝本纪》，从而奠定了黄帝崇拜的基础。

在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于黄帝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中国上古时代神话的不发达，有学者认为和中国的史官制度有关，是“神话历史化”的结果，在20世纪前半期，在学术界就存在着黄帝是神话中人物还是传说中人物的争论。时至今日，多数学者认为传说中有真实的影子，黄帝的传说绝不是空穴来风，在上古时代应实有黄帝其族。笔者倾向认为，无论是神话还是传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传说中掺杂神话，神话中有历史的影子，任何神话都离不开现实生活。古希腊有名的特洛伊的故事，后来竟真的发现了特洛伊城，这就很能说明问题。“神话的历史化”和“历史的神话化”，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都是很有意义的，不仅反映了黄帝研究中思辨理性的增长，同时也把传说时代的研究推向深入。

在20世纪初期，西方实证主义传入中国，一些学者也把西方实证主义的方法应用于学术研究，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早在1926年，中国学者就对山西汾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并发掘了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随后，又有计划地发掘了周口店遗址，发现了举世闻名的北京猿人。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是1928年由李济主持的，即殷墟的发掘，从1928年到1937年，连续进行了15次发掘，取得了较大收获，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20世纪初期从西方传入的考古学，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田野考古调查和科学发掘的有序展开，为研究中国古代史、文化史、科学史等，提供了大量前人看不到的新资料。商朝后期的都城遗址殷墟发现的大量甲骨文，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展现了商代文明的博大精

深。一般认为，夏朝是中国第一个文明国家，随着新石器时代大量的考古发现，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讨成为学界探讨的热点。我们今天常说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的，正是在传说的黄帝时期，揭开了中国文明的序幕。在当前研究中，有许多学者把史前遗址和传说时代的人物对应起来，虽然态度严谨的学者认为这种做法有太多主观色彩，但这种探讨对我们是很有启示的。1982年底，尹达为《史前研究》杂志写了一篇《衷心的愿望》的文章，他说：“我国古代社会的传说里究竟是否全属伪造？在这些疑说纷纭、似是而非的神话般的古史传说中是否有真正的社会历史的素地？”他进而认为考古学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这些神话的传说自有真正的史实素地，切不可一概抹煞”。^①

尽管疑古学者对中国上古史带来的影响巨大，但也再次印证了“不破不立”的道理。疑古学者们对中国古史的发难，促使了考古事业的发展和中国上古史的重建。殷墟的科学发掘和借助甲骨文开展的商代史研究，使商的历史摆脱了“传疑时代”，尽管至国外还有学者否认夏的存在，^② 但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认定，^③ 夏朝的存在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目前，考古工作者已发现了八九千处史前遗址，使学术界对史前文化有了全新的文化分区和族属的认知，出现了一些以族属命名的新提法，如“三苗文化”、“东夷文化”、“姜炎文化”等，虽然这些提法有的地方值得商榷，但可以看出，对于传说时期，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传说时代的历史轮廓渐露端倪，黄帝族的史影若隐若现。苏秉琦指出：“考古发现已日益清楚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为复原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条件。”^④ 他在《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一文中又说五帝可能实有其人其事，考古时代应在仰韶文化后期到龙山文化时期。^⑤ 郭沫若、邹衡也认为实有黄帝其族，金文中常见的“天鼋”就是姬周祖先氏族即黄帝族的族徽。^⑥

关于学术研究的方法，王国维曾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就是说

^① 尹达：《尹达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0页。

^② 参见王宇信《美国“夏文化国际研讨会”侧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8期。

^③ 李伯谦：《夏商周断代工程考古课题的新进展》，《文物》1999年第3期。

^④ 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1年第12期。

^⑤ 苏秉琦：《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3期。

^⑥ 郭沫若：《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卷一，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7页；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339页。

要把历史学的传世文献和考古学的发现结合起来，地下和地上材料互相印证，他用甲骨文考证商朝世系的文章《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也成为他的经典之作，这种方法也为我们的黄帝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的指导。在黄帝时代，由于成熟的文字还没有诞生，原始的刻符远不能承载记录语言的功能，我们今天看到的有关黄帝的文字是后人的述古之作，且真实和虚妄互见，研究者在某些问题上又聚讼纷纭。在历史学界，许多学者对黄帝的有关问题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总的来看，学术界对黄帝的研究，许多失之偏颇，或流于泛泛而论，尚缺乏系统而深入的考察，社会上对黄帝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共识，这是我们重新研究黄帝的因由。

一 黄帝研究概述与研究缘起

黄帝文化研究是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之一，除了其与中华文明探源密切相关外，海峡两岸对黄帝的祭祀活动，也对近年的黄帝研究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回顾近百年的黄帝研究，其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对黄帝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疑古学派”的领军人物顾颉刚在《黄帝》(《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一文中探讨了黄帝之演变，认为黄帝本为昆仑山之上帝，黄帝初则以神化人，继则由人复归于神。杨宽则从民族神话史观出发，在《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辨》第七册，1926年)中指出，黄帝之传说出于“皇帝”之字变，初为上帝之通名。信古学者则注重传说中的历史素地，如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国文化出版社，1943年)中提出炎黄属于华夏集团，黄帝氏族发源地在陕西北部。钱穆《黄帝》一书(1944年)认为黄帝最初为一游牧民族，居于河南中部，后来发展到山西南部和陕西边境。王献唐《炎黄文化考》(齐鲁书社，1985年)一书，对炎黄文化的发展变迁进行了探讨，亦认为炎黄其截然为两族。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晚年在《三皇五帝》(顾洪编：《顾颉刚学术论文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一文中对其古史观有所修正。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刘起釪再考古史的著作《古史续辨》，认为黄帝族系发源于渭水流域，标志着“疑古”学者观点的重大转向。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仍有学者坚持神话历史观(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基本都属于神话学研究，如俄国学者齐奥杰维斯基，日本学者森安太郎、御手洗胜等)，但肯定传说中的历史素地，

把黄帝作为部族或部族首领已成为这一时期大多数学者之观点。

(二) 对黄帝的族源地和活动区域进行了大胆探索。自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考证出姜水所在，并推断姬水当离此不远以来，陕西说是学界影响较大的一种说法。近年出版的何炳武、刘宝才主编的《陕西省志·黄帝陵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刘宝才、韩养民主编的《黄帝文化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柏明的《黄帝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等著作，都赞同陕西说。刘文学编著的《黄帝故里志》则主张黄帝起源于新郑。沈长云在《从周族的起源论及黄帝氏族的发祥地》(《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中，赞同黄帝起源于古涿鹿说，在《黄帝、黄帝部族和黄帝发祥地》(《文史知识》2008年第1期)中，对以前观点有所修正，主张黄帝发源于河北北部到陕北一带。王燕均的《黄帝族发祥于东方初证》(《学术界》1988年第2期)则主张黄帝始源于东方的曲阜一带。另有一些学者把对黄帝的发祥地与史前考古文化联系起来，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49年)中，就曾说仰韶文化当是黄帝族的文化。许顺湛在《五帝时代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一书中，重申了他一贯主张的黄帝时代相当于仰韶文化中晚期的观点。苏秉琦在《关于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考古》1991年第1期)中，指出五帝可能实有其人其事，考古时代应在仰韶文化后期到龙山文化时期。王彩梅在《论炎黄阪泉之战的地理位置及相关问题》(《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一文中，则认为黄帝活动的时代当属于龙山文化时期。

(三) 对黄帝研究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整理，对各地的黄帝传说进行了搜集。主要有李学勤、张岂之主编的《炎黄汇典》(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曹明周总编的《黄陵文典》(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张岂之主编的《五千年血脉：黄帝及黄帝陵史料汇编》(西北大学出版社、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3年)，何炳武、刘宝才主编的《陕西省志·黄帝陵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刘文学主编的《黄帝故里文献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等，其中《炎黄汇典》分《史籍卷》、《方志卷》、《祭祀卷》等八卷，《黄陵文典》分《文论卷》、《黄帝祭祀卷》、《黄帝研究卷》等十六卷，是目前黄帝研究的大型资料性著作。

(四) “文化热”的持续升温促进了黄帝文化研究。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各地政府的推动下，北京、陕西西安、河南新郑、河南新密、河

北涿鹿、浙江缙云等地召开了多次学术研讨会，出版了《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黄帝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黄帝故里——新郑》（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等会议论文集，有力地推动了黄帝文化研究，拓展了黄帝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但是，黄帝文化研究依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对史料的使用不够严谨。有关黄帝史迹的记载，广泛分布在经、史、子、集上百种著作中，这些文字是后人的述古之作，且真实和虚妄互见，在一些论著中，程度不等地存在着对材料运用不够严谨的情况，甚至以晚出材料轻易否定先秦文献。第二，在黄帝地望研究上，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考古材料的分析。重视现代考古学的成果，努力探索上古族邦与新石器时代诸多遗址间关系，克服在黄帝研究上先立论而后求证的现象。第三，对黄帝崇拜观念研究相对薄弱，对从古至今的尊黄现象的背景和意义揭示不够，对此需要进行全面梳理和理论总结。第四，黄帝研究的水平在质上有待提高，精品力作较为缺乏。

二 本书的主题、结构内容与研究方法

黄帝研究不仅与中华文明探源密切相关，而且对于民族认同、民族和谐和民族复兴具有重要作用。黄帝被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历史上一直保持着尊崇和祭祀黄帝的传统，当下海峡两岸每年都以不同形式祭祀黄帝，这种认同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这种认同不仅仅是血缘认同，更表现为政治和文化上的认同。因此，进一步厘清黄帝的史实，并探讨黄帝崇拜的历史背景、观念变迁和文化内蕴，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本书试图运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知识，对黄帝的史实和黄帝崇拜观念进行系统研究，其主要内容和基本思路为：

导论部分主要从宏观方面对古史传说时代进行分析，说明考古成就给古史认识所带来的冲击。通过对百年来黄帝研究学术史的回顾，客观分析在黄帝研究上取得的成绩和不足，并对本书的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作简要介绍，使读者了解本书的基本主旨和理论创新之处，增强读者对黄帝研究现状的了解和今后研究致力的主要方向所在。

第一章：早期姓氏制度的特点与黄帝族姓。由于族姓代表血缘所出，

早期姓氏制度的特点，使得其成为解读上古族源的重要锁钥。族姓一旦形成，不会轻易变更，而且一个族姓以后的繁衍分合，一般有史可查，渊源清楚，因此，族姓是解读上古族邦关系较为可信的方法。就黄帝而言，史书中关于黄帝十二姓的记载，和五帝三王都出于黄帝的世系不同，应属可信。黄帝后裔后世发展迅速，大多建国，据此可以断定，黄帝在历史上实有其族，而并非战国时人的臆造。

第二章：初期文明社会与黄帝谱系的形成。黄帝族作为上古时期的著名姓族，与其他族邦的冲突融合，使黄帝族声名远播，加上日后黄帝后裔的发展和分化，使黄帝传说广为流布。本章首先对列入黄帝谱系的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等族邦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并通过对《世本》、《大戴礼记》、《山海经》、《左传》、《潜夫论》、《帝王世纪》、《稽古录》、《绎史》等书中黄帝世系的比较考辨，说明黄帝谱系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揭示黄帝谱系形成的历史背景。政治、文化上的认同造就了万流归宗的一元谱系，它突破了狭隘的血缘认同，奠定了后世崇拜并制度化祭祀黄帝的基础。黄帝谱系主要反映的是一种族际关系，上古传说帝王的排序实质对应的是不同族邦最为兴盛的阶段，其谱系的出现是民族认同和正统史观合力作用的结果。

第三章：黄帝谱系中主要族邦与黄帝地望问题。对黄帝谱系中的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等上古族邦做了深入探讨，并主要利用考古和文献资料对黄帝族的地望做了蠡测。在研究上改变了按照当下行政区划探讨黄帝族源的做法，提出“大中原”的概念。黄帝是中原文化的象征，而古代政统的合法性正是通过对中原的掌控来体现的。中原地区考古成就也表明，中原文化发展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并不存在被异质文化侵入及取代迹象。“大中原”范围，即豫中西部、晋西南和关中东部地区是早期黄帝族的活动中心。因此，黄帝族是发源于中原地区的古老部族，早在黄帝时代，天下之中的正统观念业已萌芽。上古时代炎帝、黄帝与蚩尤间的战争，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族际间大融合，以黄帝为中心的华夏族不断吸收融汇其他族邦，民族共同体不断得以发展壮大。

第四章：上古族邦间冲突融合与黄炎子孙认同。黄帝时代业已进入初期文明社会，文明程度的快速增长、族邦冲突和融合、社会的急剧变革，是黄帝时代的重要特征。由于周边族邦的挤压，黄帝时代进入了“前战国时代”，尤以炎帝、黄帝、蚩尤间的冲突影响深远。黄帝崇拜起始于祖

灵崇拜，政治、文化的认同造就了万流归宗的谱系，而百家言黄帝，奠定了后世崇拜并制度化祭祀黄帝的基础。

第五章：古代中国黄帝崇拜观念与民族认同。通过对先秦、秦汉、魏晋迄宋元、明清等不同阶段黄帝崇拜的研究，揭示中国古代黄帝崇拜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黄帝崇拜由来已久，其崇拜渊源于黄帝族的强大和其后裔对祖先业绩的追溯、崇拜，由于上古没有确切世系流传下来，黄帝在先秦遂被个人化，又由于原始宗教中人神混同和战国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黄帝又被奉为天神而列入封建国家祀典，而且肇始于先秦的借黄帝立言之风，历经秦汉而不衰，黄帝又兼具了被方术家和道士改造过的新形象。由于对五帝认识上的分歧和封建统治的加强，元代至顺以后，官方祀典中摈除了五帝之祀，沿袭了黄帝作为历代帝王之一享祀的传统。明清时期的黄帝崇拜的特征是黄帝神性的彻底剥离，而真正体现了人文黄帝的色彩。黄帝不是源于神话分化，其兼具神人的双重属性，这种认识源于国人不死升天思想的逻辑推演。

第六章：中华民国时期的黄帝崇拜观念。在 20 世纪 20 到 40 年代，在史学领域出现了影响巨大的疑古思潮，疑古学者利用《读书杂志》和创办书社出版《古史辨》为阵地，广泛宣传疑古思想，并和信古人士进行辩论，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尽管 20 世纪疑古思潮的兴盛近半个世纪，但其影响的范围尚还局限于学术界，对当时社会的一般观念冲击有限。自 1935 年起，清明节被定为“民族扫墓节”，每年定期举行祭祀黄帝的活动，即便在学术界，认识也更趋多元化，在帝王崇拜的基础上，由于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时代动因，黄帝人文初祖的属性日益彰显。

第七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黄帝崇拜观念。对黄帝的认识进一步深化，除短暂时期外，黄帝崇拜进一步加强，黄帝作为上古帝王，尤其是人文初祖的形象深入人心，彰显了黄帝作为中华民族始祖的符号意义。陕西黄陵、河南新郑、浙江缙云和台湾地区对黄帝的拜祭活动，尽管有着一定程度的政治或经济因素，但迎合了民族认同的精神需求。历史上的民族认同促进了黄帝崇拜的发展，在黄帝制度化祭祀的传承背后，有着深层的思想根源。反过来，黄帝崇拜对于进一步增强民族认同、民族和谐、民族复兴和实现海峡两岸的早日统一等方面具有难以替代和不可或缺性。

第八章：余论。中国不像古希腊有着发达的神话系统，因而原生态的上古传说不可完全等同于神话，其传说中的历史素地是不容抹杀的。中国

的祭祀文化源远流长，祀与戎构成了古代国家政治生活的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从黄帝形象的演变脉络看，亦经历了从人到神、从人神杂糅到人的回归，祭祀活动本身表达的是对去者的追思和对生者的希冀，黄帝作为中华民族象征性的祖先，反映了中华民族尊老敬祖、慎终追远的文化传统。

本书是利用多学科知识和最新成果对黄帝史实与崇拜进行研究的一部著作，力图还原黄帝以及五帝时代的历史真相，并第一次对从古至今的黄帝崇拜观念进行了系统梳理。在具体问题上：（一）从族姓制度和古代姓氏制度的特点出发，论证黄帝在历史上实有其族。（二）把黄帝时代和五帝时代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视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时期，在文明起源模式上，根据中国国家的特点，发展了“族邦”理论，而没有照搬塞维斯等人的“酋邦”理论。首次提出了“族邦”理论的四个特征：第一，族邦处于文明形成前的过渡期。第二，宗族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异族作为宗族附庸而不是有机组成部分。第三，有了初步的社会分层和天下之中的认识。第四，公共权力的有限性和领土边界的模糊性。（三）在对黄帝谱系中各传说人物，根据传统文献和新发现简牍文献作了系统分析，在指出这种谱系是先民历史意识觉醒的产物的同时，肯定这种谱系有其合理的一面，其帝位传承的前后序列背后反映的是这些族邦的兴盛阶段，并根据考古资料、青铜器、文献资料，对黄帝族的地望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做了尝试性对接，并提出了“大中原”的概念，主要包括河南中西部、关中东部和山西南部一带，不以今天某省域范围考察古文化遗存。（四）提出“前战国时代”的概念，在对炎帝、蚩尤、黄帝部族间关系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炎黄时代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族群大融合时期。（五）第一次对从先秦到当代的黄帝崇拜观念作了较全面系统的梳理。

在研究方法上，首先运用“多重证据法”对黄帝相关史实进行考证。早在1925年，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主张把纸上材料和出土新材料结合起来，并利用这种研究方法研究古史，取得了卓著的成绩，使殷商史摆脱了传说时代。近百年来，考古学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各地的文化谱系基本梳理清楚，除了甲骨文、金文外，还发现了大量的简牍材料，出土新材料比王国维生活时代更加丰富。相比我们的前辈，我们今天占有更多的资料，而这种新资料是新发现的重要基础。先秦史研究的范围随着考古学等的发展不断得以扩大，因此，利用多学科方法对黄帝相关史实进行研究，而对于考古学、古文字学、文化人类学、文献学等多学科知识的

运用，是我们决定对黄帝再研究的主要动力。

其次，对资料的收集采用“开矿山式收集法”。这种资料的收集方法是蔡尚思提倡的，这种方法在今天亦没有完全过时，尽管有了电子检索这种新方法，但检索的范围毕竟有限，难以涵盖众多的文献资料。从目前一些黄帝资料汇集的基本著作看，在资料收集的广度上尚有很多欠缺，因此，在研究中，我们有针对性地采取这种“开矿山式收集法”，尽可能全地汇集有价值的黄帝研究资料，从而保证研究的质量。

最后，运用知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注重对思想观念的深层考察。本书对黄帝崇拜观念的形成和研究做了全面整理，在材料的梳理和分析基础上，注意考察不同时代黄帝崇拜观念的历史语境，揭示有关黄帝的知识、思想、信仰被建构的过程，有助于理解不同时代黄帝崇拜的特点，把握黄帝崇拜这一社会现象的文化成因。

第一章 早期姓氏制度的特点与黄帝族姓

我国上古的姓氏包蕴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它不仅是社会结构的反映，也展示了社会的递嬗和演变。因此，从姓氏制度入手，对我国早期社会结构进行探讨和分析，应是最为可靠的方法。一般认为，族姓出现在母系氏族社会时代，作为氏族标志的族姓的产生和“别婚姻”不无关系。对于同姓不婚的肇始期，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看法。有的认为同姓不婚起源于原始社会的亚血族群婚；^① 有的认为殷代以前同姓六世后男女或可通婚，同姓不婚实始于周代；^② 还有的学者提出同姓不婚观念应产生于父系家长制家族形成以后。^③ 我们认为同姓不婚观念在母权时代已经产生，族内婚的被禁止，可看作是同姓不婚观念的萌芽形式，而更大范围的通婚被全面禁止，其过程可能延续到父权家长制家庭形成以后。

第一节 先秦时期姓氏制度的特点

早期先民对“同姓不婚，恶不殖也”、“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的朦胧认识，^④ 使婚姻关系由族内转向族外。父权制确立以后，婚姻的族外择偶形式已带有“非但防嫌，亦以戒独也”的性质，^⑤ 正所谓“取于异姓，

^① 李亚农：《周族的氏族制度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华东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17 页。

^②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参见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3 页。

^③ 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88 页。

^④ 《国语·晋语四》，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349 页；《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408 页。

^⑤ 《日知录》卷六《娶妻不要同姓》，（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70 页。